

中国人何时能够不再造神,不再盲目崇拜,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国人的思想负担才能解除,中国社会才能进步。



逆境中探索的思想家

——顾准思想研究

■张曙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导

第一个问题讲顾准在经济理论上的贡献;第二个问题讲顾准在政治哲学和政治学理论上的建树;第三个问题讲顾准在逆境探索和苦难中悟道;第四个问题讲如何来评价顾准。

有些问题我讲得很简单,比如顾准在经济理论上的贡献。我讲三个问题,一个是顾准的市场调节理论,主要是他1957年的那篇文章。尽管当时讨论问题还都是用马克思主义的那一套范式、概念和方法,但是,这篇文章里面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观点):第一点,他认为我们现在的计划经济是经济核算下的计划经济,而马克思没有经济核算的概念。第二点,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货币的问题,斯大林的解释是因为存在两种所有制,顾准不同意,认为主要是经济核算问题,企业有自己的经济利益。斯大林认为生产资料不是商品,消费品是商品。他认为,既然消费品是商品,生产资料也是商品,不能把完整的再生过程割裂开来。既然生产资料的一部分是商品,也可以推导全部生产资料都是商品。最重要的是,他认为,既然承认价值、承认价格,价格不仅是调节消费品的生产,而且调节生产资料的生产,调节整个经济。这一点恐怕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后才有所突破。所以吴敬琏有一个概括我认为是对的,即顾准是中国市场经济第一人。

第二,顾准的价格理论。他同时写了一些有关价格,粮价之类的文章。他的价格理论和他的上述思想是一致的。薛暮桥的价格理论实际上是沿着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走的,是成本价格理论,或者是供给决定价格的理论,因为马克思的价值论也是供给理论。顾准认为价格不光取决于成本、供给,而且决定于需求。薛暮桥没有看到价格的需求因素,既然价格既与供给有关,也有需求的因素,也就与市场的波动和变化有关。这是他在价格理论上很重要的一点,和这些人的看法不一样地上。

我着重想讲的是顾准的“糊口经济”和“饥荒理论”,这是现在研究顾准的人都没有提到的问题,所以我想重点讲一下这个问题。顾准的“糊口经济”和他的“饥荒理论”没有一个成型的东西,主要是他在商城日记里面的记述。我把他的商城日记看了好几遍,梳理出一个大致的脉络和框架。

改革前的中国经济属于什么样的经济形态,理论界有多种说法,诸如,计划经济,战时经济,自然经济,短缺经济,二元经济,等等,这些概念虽然都能描述当时中国经济形态的某些特征,但都不够恰切。有的着力描述中国经济的外在表征,有的侧重于描述中国经济运营的方法,有的界定是通过类比进行描述,有的界定则名实不相符合,有的界定在概念上还有混淆。总之,这些概括都没有揭示出它的结构状态和生产目的,而顾准提出的“糊口经济”,不仅生动具体,微妙微妙,而且入木三分,切中中国经济,特别是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本质和要害。

所谓“糊口经济”,顾名思义,就是全部经济生产都是为了填饱肚子,也只能勉强填饱肚子。当时甚至到1978年,中国的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80%以上,在农村和第一产业中就业的劳动力也占70%以上,基本格局的确是就人力刨食吃的“糊口经济”。其特征有,一是自然经济和自给经济而非商品经济,商品率极低;二是存在广泛的稀缺和

严重的匮乏,但严格地说,不存在短缺,也不是短缺经济,因为短缺是相对于有货币购买力的需求而言,既然是自然经济和自给经济,也就谈不到有货币购买力的需求;三是以生存为第一要义,以满足最基本的需要为唯一目的;四是没有经济剩余,也没有储蓄和积累,充其量是一种简单再生产,在一定情况下,甚至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

为什么说中国经济是“糊口经济”?按照顾准的分析,这种经济形态有其必然性。因为中国各省的条件很差,人口稠密,个别年份和个别地区除外,几乎是“无一省不早,无一省不灾”。于是,对地球开战,“啃山吃水,消尽自然资源,若非灾荒一兵一匪,必是治山治水,慢性饥饿和死亡”(《顾准日记》第184页,本节以下只注页码)。顾准以商城的实际加以论证,他指出,“商城全县平均,每人不足耕地一亩,还包括北部平原黄泥巴地在内。1929年以前,商城红了,又变白了,死了一批,走了一批,但人口/耕地比例,若有(不)确切数据,目前必低于1927年以前”(第185页)。因此,吃饭问题确实是当时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后治理中国最大的问题。

针对艾奇逊预言中国共产党解决不了吃饭问题,毛泽东指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中国人口广大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1956—1957年,毛泽东曾经几次谈到节制生育问题,提出“要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但1958—1974年再也没有讲过这个问题,反而大讲“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推动了中国人口的快速增长,从1950—1960年,人口从5.5亿增加到6.6亿,“糊口经济”也愈演愈烈。顾准以在商城的亲身经历给以确证,“彭铁不过三十,四个孩子。黄渤一家十五口,其中孩子九个,没有超过九岁的”(第185页)。“人口如此,而农村经济的基本方向,可以何详福昨天所引证的商城山区人所自豪的一句话来揣摩其典型的糊口经济的方向。如果山区的这家人家,过神仙生活之余,孩子一个二个下来,又无新耕地可辟,必定做樵夫,破坏山林,最后全家沦为贫农”。在这种糊口经济和人口大量繁殖的情况之下,“农村不会有积累,所能积累的只是自然增殖的过剩人口”(第186页)。在这里,顾准不仅准确地描述了中国农村的经济现实,而且揭示了中国当时体制下的人口规律及其与糊口经济之间的关系。

面对这种经济现实,毛泽东不仅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而且确立了十五年超英赶美的目标。这样,农业就肩负着三重负担却几乎不能有所得,“(一)支援国家工业化,低价搜尽一切农产品;(二)支援城镇工业建设,商城的机械厂之类也靠在他的身上;(三)完成农业本身商品率提高的任务,水利和猪场建设属于此类”(第210页)。为了做到这一点,顾准认为必须消灭和改变“糊口经济”,将此看作是中国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

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实现这样的任务和目标,完成这样的历史使命?顾准指出,“1953年以前他(指毛泽东——引者注)不懂,以后他逐渐懂得了,并且摸索一些解决办法,他试过好几个药方,结果选择了现在的药方——马列主义的人口论,恐怖主义的反右斗争,驱饥饿的亿万农民从事于过度劳动,以同时达到高产、高商品率的农业和消灭过剩人口——最堂皇、又是最残酷、最迅速、最能见效的办法”(第232页)。为此,毛泽东“建立了一套实现这一办法的体制,经多年经营,已经成功。其结构如下:

- 甲:公安户籍体制。有此一条,灾区农民,无法流入城市,每天吃菜一顿,也不能再外出逃荒。
- 乙:人民公社。依然是产业军体制,它把纯粹农村结构组织成营连,并可以从中随时组成野战(如水利)队伍。
- 丙:公共食堂。把农村粮食消耗彻底控制起来,使“粮食出荷”不足以造成骇人听闻的个别饿死人事件,饥饿限于慢性,死亡

起于肿病,医生若说是饿死的,医生就是右派或右倾机会主义者。

所以,在宪法有居住自由这一条规定之后,有逃窜犯的名目”(第184页)。

通过这套体制,政府就能控制生产,控制分配,控制消费,控制整个社会经济生活。控制生产和控制分配的办法是“征购”和“核产”,“所遵循的唯一原则是根据上级的指标定产量,根据上级的意图做调查”(第183页),于是就形成了高指标,大征购,甚至把口粮和种籽也拿走。控制生产和分配是为了控制消费,只有控制消费,才能极度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而“公共食堂成为粮食消费管理——管得彻底无比的武器”(第149页)。

通过这套体制,就可以把劳动力的价格贬低到无可再低的程度,并阻止城乡劳动力的流动,一方面为工业生产和城市建设提供极其廉价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可以迅速进行积累,不仅可以动员七千万人上山搞水利,炼钢铁,而且“大小工业都可以不计成本地建立起来,还有剩余,那么开大的大会,商城的戏院就应运而生”(第196页)。

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是,造成了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大饥荒和严重的经济危机。《商城日记》真实地记述了当时的情况,并总结出饥荒中死亡的规律:病了,肿了,“走”了。缺粮和饿死人从1959年冬就开始了,顾准该年11月1日的日记就记有“农村如此紧张,水库民工回去背米不得,吃一顿菜上工,成为偷萝卜的根源”(第139页)。11月4日的日记有,“前日徐云周儿来,徐家断炊。收成,亩产三四百斤,各家偷藏一些稻米,均被翻检出去。来时断炊,吃菜而已”。“刘引芝的父亲死了,肿病——劳动过度,营养不足。缝纫室张的哥嫂几乎同时死亡,也是肿病”(第139—140页)。“肿,到处都是肿”。“民间肿得更厉害。民工,一眼望去,肿的很多,病员们说,还有全家肿的”(第173、174页)。接着,到处听到家内死人的消息,“死人,已知柳学冠之弟、杨文华的女儿、刘方惠的父亲。其他所听说的还不少”。还有“死人续志:柳学冠母弟同时死了,杨柔远母亲死了。夏伯卿家死了人。张保修家死了人”。“八组黄渤家中,老婆、父亲、哥哥、二个孩子,在一个半月内相继死亡。这个家庭特别大,……十五个人中死五个,则死亡比例不算小了”(第177页)。“徐云周说,沈家碾附近一个生产队,七十余人死了三十余人,这是一个典型的数字了”(第242页)。同时发生了人相食的骇人事件,“除民间大批肿——死而外,商城发生人相食的事二起。19日城内公审,据说20日要宣判。二起人相食,一是丈夫杀妻子,一是姑母吃侄女”(第183页)。

顾准进一步揭露了一边是饿殍遍野,人相食,一边是朱门酒肉臭。他说,固然劳动队是天堂,“生活水平高于农民是事实,可是在此哀鸿遍野之时,商城生活水平高的人还有的是。蔡璋说,他那儿住着城关公社的党委书记,天天吃肉,天天吃油果子。接新兵的人在这儿,开各色各样现场会的人在这儿,天天好招待”。“沈(万山,劳改农场的场长——引者注)公开地吃,鸡、肉常有”(第188—189页)。

为了维持这一套体制的运行,于是大讲和大搞政治挂帅、阶级斗争和思想改造。一边是“为饥饿所苦”,是“对肿的恐怖”,一边说什么“粮食问题是思想问题不是实际问题”,“空话连篇,相互欺骗”(第195页)。

顾准明确指出,“二三年以后来统计人口,就会知道大跃进实行Malthus(马尔萨斯)主义”,“强迫劳动,慢性饥饿和死亡,是大跃进必不可少的产物,也是新的人口问题的”。“解决之道”(第146—147页)。这是“用说谎、专制、严刑峻法、无限制的斗争来完成历史的使命”。顾准明确表示,“我不忍参加这个剿灭人口的向地球开战的战役”,在“新局面开始前,沉默自全,跟着走,记录历史,使这个时期的真相能够为后人所知”,并坚决主张改弦易辙,代之以“坦率、开明、宽恕、人道主义,文明”的

方式,“这意味着粮价的提高,农村粮食供应尺度放宽,公共食堂方向取消而代之以严格的工资制”(第186、187页)。

大家知道,诺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深入研究了贫困、饥饿和饥荒,写下了《饥饿和公共行动》(1989)、《贫困和饥荒》(1981)、《饥饿的政治经济学》(1990)、《以自由看待发展》(1999),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反贫困和反饥荒理论,其中也讨论了中国的饥荒问题。他认为,“贫困必须被视为基本可行能力的被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而这却是现在识别贫困的通行标准”。“在分析饥饿现象时,至关重要的因素是个人和家庭所拥有的、用来建立对足够数量的食品具有所有权的实质自由”。“我们必须集中注意的是,不是经济体中的粮食总供给,而是每个人所享有的‘权益’(entitlement):一个人可以建立其所有权并加以支配的商品,在不能对足够数量的粮食建立起他们的权益时,人们就会挨饿”。饥荒甚至会在粮食生产或可供量丝毫没有下降甚至粮食如此量高峰期发生,1974年孟加拉国就是例证,“即使饥荒确实与粮食生产下降相联系(中国1958—1961年的饥荒和爱尔兰19世纪40年代的饥荒就明显是这种情况),我们还是要超越产量的统计数字,进一步去解释为什么一部分人口丧失了生命,其他人则安然无恙”。“饥荒的防止非常依赖于多保障机制的政治安排”,“在一次饥荒”,“如果没有选举,没有反对党,没有不受审查的公共批评的活动空间,掌权者就不会因为防止饥荒失败而承受政治后果。而在另一方面,民主会把饥荒的惩罚作用传递给统治集团和政治领导人,这就给了他们以政治的激励因素去试图防止任何有威胁性的饥荒”。“政治权利与经济需要之间的关系,就防止饥荒这个特定问题而言,可以通过考察中国1958—1961年的大饥荒来加以说明。即使在最近发生的经济改革以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很多重要方面就一直比印度成功得多。例如,中国的平均寿命期望值的增长大大高于印度,而且远在1979年改革之前,就已经非常接近于现在达到的高水平(出生时寿命期望值接近70岁)。即便如此,中国在防止饥荒上曾有重大的失败。在中国1958—1961年间的饥荒中,许多人未能幸免”。20世纪50年代后期发展的所谓“大跃进”是一个重大的失败,没有一个自由的新闻传播体系,政府听到的是它自己的宣传和争着向北京邀功的党的地方官员粉饰太平的报告。确有证据表明,当饥荒正达到顶峰时,中国地方还在错误地相信他们有超过实际拥有量1亿吨的粮食”。

如果把顾准的记述与森的分析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关于饥荒理论的一切要素在顾准那里已经提及,只是未曾展开,不曾成文,而关于中国大饥荒成因的分析,虽然森也强调了政治民主和实质自由的重要,但顾准的分析则要深刻得多,具体得多。然而,从时间来看,顾准的记述比森的分析提前了整整20年。这的确是相当了不起的。如果顾准能够有森的研究条件,那么,他在这方面的理论创造也许不在森之下。

第二个问题,我想讲一下顾准的政治哲学和政治学上的建树。主要是概括顾准和陈敏之的学术通信,就是《理想主义和经验主义》里面的内容。我把他这套理论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关于民主政体和专制政体的理论。世界上的政治体制五花八门,概括起来就是民主政体和专制政体两类。根据顾准的说法,民主政体发生于西方国家,立足于希腊的海上文明,专制政体分布于大陆国家,建立于陆上文明,这个大概分歧不太大,而且历史也是这样,中国的古代文明和希腊文明都是从中亚出发的旧大陆的古老文明发展而来的。但是公元前7—6世纪,恰好是咱们的春秋战国时期,希腊是向民主主义转变,中国是向专制主义转变。

在民主政体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有三个大问题最为,一个就是希腊的城邦制度,第二个是基督教的历史演变,第三个是骑士军制和骑士精神。顾准紧紧抓住这三个方面,阐述了他的政治哲学和政治学思想。因

为时间关系,具体内容我讲不了了。希腊城邦制度就是希腊的民主制度,基督教既做了很多坏事,但是它是中世纪唯一的教育事业的组织者,也是唯一的学术研究中心,基督教会也成为世俗政治权威以外的另一个政治权威。希腊罗马的文明能够传下来,恐怕是同基督教有很大关系。至于说骑士军制这套东西,我们看顾准有一篇文章讲马镫的发明,就是马镫一个很小的发明,确实改变了军事战争的性质。那些骑士当时在西欧社会里面和中国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骑士不仅因“授土”而“效忠”,而且受封者和授封者都必须信守契约,也就是说,“除骑士不尽责外,不得享受权利而外,还有,王侯超额需索,骑士可以反抗。这就是英国大宪章Magna Carta的来历,也是英法等国议会的实际起源”。他们之间是一个契约关系,不是血缘的关系,民主政制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的。

第二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讲直接民主和代议民主。这也是顾准思想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因为民主不是一套讲的,而是要实施的,要实施就要建立一套民主政治,就要解决民主的运作和方式方法问题。顾准认为从直接民主到代议民主有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第一步是罗马传承,第二步是等级君主制的出现,第三步是议会的产生,第四步是权力分离和政党政治,这个也不用仔细讲了。他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直接民主是复古,是一个很古老的古,复希腊的古,人民当家作主是空话。大家知道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里面批判议会清谈馆,推崇人民当家作主的直接民主,而且把当时巴黎公社的民主作为人类社会未来的政治图景来推荐的,他给出的法兰西政治体制包括,一个是法国各城市都组成巴黎公社式的公社,第二个是共和国是各公社的自由联合体,第三个,打破拿破仑皇朝建立的官僚体制,恢复雅典时代的没有行政机构的做法。第四,取消常备军,实行不领军饷,轮流义务兵役制。顾准指出这是复共和罗马之古,即复直接民主之古。列宁相信直接民主并且亲自加以实施,结果是一切权力属于苏维埃变成一切权力属于党,后变成一切权力属于斯大林。这是历史的现实,也是极大的讽刺。毛泽东也信奉直接民主,并且加以推行,文化大革命就是直接民主的典型,结果是无政府主义的暴民政治,人民生存权利失去了起码的保证。所以,我认为顾准的批判是非常深刻的,他说直接民主的口号,人民当家作主的口号是一句空话,我们实际上不可能做到人民当家作主,那一定是无政府。我们所要的是不许一个政治集团在其执政期间变为皇帝及其皇庭,就是政治权力不是独占的,而是有人在旁边觊觎的,而且这种觊觎是合法的。他明确指出,顾准是一个专门行业,政治家也是一个混饭吃的营生,是一个专业,不是什么特权。

他的政治哲学的第三个重要内容是关于资本主义和异化批判。关于怎么看资本主义,为什么西方发生了资本主义,顾准的说法也与马克思的不同,他认为资本主义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现象,而且是一套法律体系,英国之所以工业革命以后建立资本主义,是建立了足以保护它的商业利益的统一王国,并以保护商业利益的扩张为基本国策,所以才成为资本主义。顾准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在60年代他就认为资本主义是可以变化的,认为资本主义出了两个奇人,一个就是理论家凯恩斯,一个就是希特勒的高级助手,一个理论家、一个实践家,来对资本主义进行修正。所以,他读了《通论》以后,认为凯恩斯实际上解决了资本主义在不断的批判中间改良、进步的问题。他认为资本主义在变,而且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实际上也是小骂大帮忙,对资本主义是有利的。他还讲到现代帝国主义,认为现代帝国主义也在变,现在帝国主义变了,资本主义也变了。变的原因,在于他们不是限制,相反还在发展批判,不断地揭发批判促进的资本主义的改良。想一想,我们80年代才讲重新认识社会主义,重新认识资本主义,顾准在60年代已经解决了这样的问题。

(下转 04版)

乌克兰央行将利率提升至30%

乌克兰将其基准再融资利率急剧提升了10.5个百分点至30%,这一绝望举措是为了抑制加速上升的通货膨胀,并制止汇率的暴跌。

乌克兰东部的战事已经令该国陷入一场金融危机,由于资本外逃,乌克兰央行最近已实施了诸多货币和资本控制举措。该行3月3日宣布将主要利率从19.5%提升至30%,就是这些举措中的最新一例。仅仅一

个月前,该行还将利率设置在14%的水平上。

路透社援引乌克兰央行行长瓦莱里娅·甘达列娃表示:“考虑到通胀威胁已急剧升高……为稳定局面,货币政策委员会(Monetary Policy Committee)建议……提升利率。”

凯投宏观称此举是一种“试图重新控制汇率的……绝望努力”。自今年初以来,乌

克兰货币已经在2014年贬值40%的基础上又贬值了40%。该机构在一份报告中补充说:“推出这一举措的原因,是乌克兰出现了大规模资本外逃,而当局的外汇储备却不值一提。”

甘达列娃表示,此举旨在帮助将格里夫纳(hryvnia)推回1美元兑20至22格里夫纳的水平,“这一区间在乌克兰政府预算所采用的1美元兑21.5格里夫纳的水平附

近。

近日,格里夫纳先是跌至1美元兑33.75格里夫纳的创纪录低点,后来又小幅回升至24.25的水平。和2014年一样,格里夫纳是今年迄今全球表现最差的货币。

就在乌克兰央行推出这一举措之际,乌克兰的议员日前急于通过一揽子财政紧缩及改革的法案,以解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规模为175亿美元的新一轮纾困计

划。

IMF和乌克兰官员都曾表示,一旦IMF理事会批准这一纾困计划,部分资金将优先用于稳定乌克兰极度紧张的财政状况并补充已经枯竭的央行外汇储备。目前,乌克兰央行的外汇储备已跌至只够一个月进口所需的水平,远低于3个月的外汇储备警戒线。

(FT中文网)